



贾学军

JIA XUEJUN

著

福斯特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思想研究

Study on Foster's Thought of
Ecological Marxism



人民出版社

福斯特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思想研究

Study on Foster's Thought of
Ecological Marxism

贾学军
JIA XUEJUN
著

责任编辑:洪 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贾学军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2
ISBN 978 - 7 - 01 - 017225 - 5

I. ①福… II. ①贾… III. ①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研究 IV. ①A811.6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21735 号

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

FUSITE SHENGTAXUE MAKESIZHUYI SIXIANG YANJIU

贾学军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5.75

字数:300 千字

ISBN 978 - 7 - 01 - 017225 - 5 定价:54.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

自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发表惊世之作《寂静的春天》以来,对生态危机与人类续存问题的思考已成为当今时代最重要的社会话题,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全球生态环境恶化才是 21 世纪人类面临的长期的最大的敌人”。为了寻求生态危机的解救之途,学者们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与探讨,并逐渐形成了“绿绿派”与“红绿派”两大阵营。“绿绿派”主要由生态原教旨主义者、生态无政府主义者和主流绿党等构成,他们的理论主张倾向于后现代主义、无政府主义,否定工业文明及其发展观,主张反增长、反生产、反技术的价值取向。而“红绿派”则主要是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与社会民主主义者,他们更愿意基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理论传统构建一个以维护生态平衡为基础,充分保证人们享受现代文明成果的社会经济制度。在这些“红红绿绿”的理论流派中,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特别引人注目。与其他绿色理论相比,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比较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方法,从社会制度、社会生产方式以及文化等层面深刻揭示了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为当代资本主义批判展开了新的维度,并且描绘了生态社会主义的未来图景,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

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历程中,美国左派批判学者、俄勒冈大学社会学教授、《每月评论》杂志主编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无疑是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福斯特 1953 年出生于美国的太平洋西北岸,在 1971 年考入美国常青州立大学之前,他已是一位反战及环境运动的积极分子。入学初期,福斯特兴趣广泛,但是 1973 年美国主导的反社会主义的智利政变以及 20 世纪 70 年代初日益增长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促使其专心于政治经济学研究,正是在此阶段他接触到了保罗·巴兰与保罗·斯威齐的“垄断资本主义”理

2 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

论。1976年,福斯特离开美国进入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主修政治学研究生课程,在此期间,与尼尔·伍德(Neal Wood)、艾伦·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加布雷·科尔克(Gabriel Kolko)、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等北美著名左派批判学者建立了一定的联系与交往,并确定了其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定向。1984年,福斯特在约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经修订与扩充后定名为《垄断资本主义理论》(*The Theory of Monopoly Capitalism: An Elaboration of Marxian Political Economy*)于1986年发表,此时,生态与环境问题是处于福斯特理论关注之外的。1985年,离开家乡十年后,福斯特重返太平洋西岸,十年之间家乡在环境上的巨大反差迫使福斯特认真思考生态危机问题,并把这一反思的视角投向全球生态危机以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从此开始了其长期的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研究,并把这一研究积极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发表了大量的著述,使其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中发出了自己独特的声音。

在对资本主义进行生态批判的尝试之前,福斯特主要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资本主义进行分析的,使用的理论工具主要是保罗·斯威齐的“垄断资本主义”理论。正是这一理论背景,使福斯特在一接触生态问题时就敏锐地把经济作为分析生态危机的主要突破口。与传统绿色理论一般从文化与伦理批判和早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要从控制自然与消费异化角度进行批判不同,无论是在《脆弱的星球》中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所进行的经济史梳理,还是《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中对资本主义社会反生态本质的揭露,福斯特都尝试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理论结合在一起进行思考。就福斯特的理论旨趣来看,他关注的不是资本的逻辑对消费时代的意识形态建构,不是由于自然的限制而导致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更不是伦理意义上利己主义的人对自然权利的无视,他考虑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为什么必然会导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以及如何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同时又能保证生态环境不受破坏。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福斯特一方面发展了“垄断资本主义”理论,把资本的扩张本性引入到全球生态危机的分析维度之中,为“垄断资本主义新阶段”贴上了生态帝国主义的新标签。另一方面为了坚实其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的理论基础,福斯特积极回到马克思的理论中寻找支持。在深入挖掘马克思生态思想并考察了当代生态学者们对马克思的片面理解后,福斯特以“生态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指明了马克思生态学的主题,整体勾

画了马克思生态学的基本轮廓。通过考察“马克思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历程，他以伊壁鸠鲁哲学为起点构建了马克思的“自然唯物主义”；通过分析唯物主义如何促进生态学思维的产生，以“新陈代谢”为中心概念阐释了马克思的“生态唯物主义”思想，反驳了绿色理论家对马克思的指责；通过对资本主义与生态危机关系的考察，展示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以及生态革命的政治实践要求。

福斯特对马克思生态学的重新阐释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它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诠释，不仅为当今的生态学发展提供了带有原则性的理论指导，更重要的是它对于我们今天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转向生态文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但他的思想中也存在着一些理论局限性。其中，最主要的缺陷在于：为了重建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他把马克思自然唯物主义的形成追溯到伊壁鸠鲁，从而误读了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我们认为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所具有的实践唯物主义特性以及他对资本主义本质矛盾的提示与批判才为所谓的“生态学唯物主义”奠定了最为本质的理论根基，同时也是我们今天反思人类中心主义、评述自然伦理、自然价值等热点问题的根本理论基点。尽管其论述中有诸多不足，但无可置疑，福斯特是迄今为止最系统地论述马克思生态学思想的理论家，其论述从纵横两个维度展开，既纵贯了马克思的一生及马克思主义产生与发展的历史，又横跨哲学、自然科学、社会学、经济学、生态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他研究所得出的结论——马克思主义本质性地包含着系统的生态学思想，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体系为解决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提供了全面而系统的理论——拓展了对马克思的理解，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本书的主要篇章结构如下：第一章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史进行梳理，为进一步研究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理论平台。第二章对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首次理论尝试进行分析，这一阶段他主要把生态问题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结合起来进行考察，通过这一历史性的梳理，福斯特发现了资本主义与生态的对立。但此阶段福斯特对生态问题的关注仍抱有极强的“绿色浪漫”倾向，他认为通过环境正义运动把自然社会化就可以解决当前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问题，这一理论倾向使其思想更多地是与各类绿色理论与新社会运动相联系而不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第三章对福斯特系统建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分析。这一阶段是福斯特理论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他对初次

4 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

理论尝试自我反思后的明显提升。为了确立其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的理论基础，福斯特自觉地回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寻求支持，通过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重新解读，福斯特发掘了马克思“物质变换”概念的生态内涵，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他以“物质变换断裂”和“自然-社会协同进化”为核心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建立是与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生态学重建分不开的，无论是早期的莱斯与阿格尔还是高兹与奥康纳，他们在阐明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都伴随着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修正与重构，本章试图通过探讨福斯特与学派内其他学者生态地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不同研究范式及理论关注点，确立该学派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拓展的意义。第四章主要分析福斯特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此阶段福斯特应用其创立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通过对技术的使用、经济制度及社会运动等方面的综合分析，揭示出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及资本家对利润的无止境的追求是导致人异化、自然异化和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最根本的社会原因，指出为了克服当前仍在不断扩大的人与自然间的物质变换裂缝必须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制度。传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一般从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与消费的异化两个层面展开，而福斯特依据其发掘的“物质变换断裂理论”，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变本性出发展开生态的批判无疑开创了一个新的理论关注点。第五章对福斯特帝国主义批判及生态社会主义思想进行研究。关于如何为生态危机寻求政治解放战略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福斯特结合对当代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新阶段的批判，从经济、政治、生态等多重维度拉伸出了一条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革命之路，并把这种整体性的社会变革看作解决生态危机的最终可能，这样他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资本的全球权力关系与生态危机结合起来，为最终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提供了一种理论设想。最后的结语部分主要分析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本书受到江苏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生态帝国主义及其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影响研究”
(项目编号: 15MLB006) 与
南京市重点建设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资助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发展	1
第一节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	1
一、工业文明的发展与全球生态危机	2
二、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消沉与“新社会运动”的兴起	7
三、“红绿交融”与“绿党”红化	15
第二节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	19
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来源	19
二、生态伦理主义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	22
三、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关注与批判	26
第三节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演进与学术传统	36
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演进	36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传统	41
第四节 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特色	51
第二章 《脆弱的星球》:福斯特对生态危机的历史性描述	55
第一节 资本主义:生态问题与生态危机的分水岭	56
一、资本主义之前生态问题的特点	58
二、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生态危机的积累和扩大	62

第二节 资本主义经济扩张:生态危机的深化与全球化	73
一、资本主义的“边疆拓展”与环境保护运动的发端	74
二、“中心”与“外围”:资本的全球扩张与生态危机的输出	77
三、技术的缺陷与“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全球生态危机的新阶段	82
第三节 自然的社会化:解决生态危机的初次尝试	86
第三章 《马克思的生态学》: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起点	91
第一节 唯物主义与生态学思想的统一	91
一、马克思与生态的“冲突”:对马克思缺乏生态意识的指责	92
二、误解与歪曲:对马克思缺乏生态意识指责的原因	94
三、唯物主义的三种形式及其与生态思维的统一	97
第二节 对马克思“唯物主义生态哲学”的解读	101
一、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基础及其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影响	102
二、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117
第三节 建构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	131
一、“新陈代谢”概念的提出	131
二、马克思对“新陈代谢”概念的使用	136
三、“新陈代谢断裂”:自然异化及自然与社会关系的异化	138
四、“新陈代谢断裂”的解决之途:消除异化,走向可持续	144
第四节 从自然进化论到自然与社会协同进化	149
一、达尔文的影响:基因—文化协同进化理论	149
二、马克思晚年对人类学革命关注的生态内涵	155
第四章 《生态反对资本主义》:福斯特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	159
第一节 生态危机的规模及根源	159
一、时间的尺度与人类的续存问题	160
二、当前生态危机的特点与根源	164

第二节 对资本主义经济视域中生态危机解决之途的批判	167
一、自然资本化：环境经济学书写的“乌托邦神话”	168
二、技术改良主义：资本主义的技术观	170
三、自由市场：解决环境问题的虚假想象	174
第三节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出路	177
一、资本主义制度反生态的四条法则	177
二、“无阶级生态运动”的失败	179
三、“生态转化战略”及生态社会主义	182
第五章 《赤裸的帝国主义》与《生态革命》：福斯特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	186
第一节 “新帝国主义”：西方学者对资本主义的新图绘	186
一、“新帝国主义”理论的产生背景及其提出	186
二、“新帝国主义”的特点	190
第二节 帝国主义新时代与生态危机	193
一、“帝国”与帝国主义	193
二、“新帝国主义”的本质	198
三、生态帝国主义	203
第三节 生态革命：从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	209
一、为什么需要生态革命	210
二、需要什么样的生态革命	214
三、生态社会革命	218
结语：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意义	224
一、理论意义	224
二、实践意义	228
参考文献	235
后记	242

第一章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发展

第一节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它总是以一种批判的、革命的态度与现实生活的发展保持联系,并在反映和揭示时代的各种矛盾,关注和回答时代提出的各种问题的同时不断变革自身形态,推动自身发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判断与理论反思,其产生与发展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首先,人与自然矛盾逐渐凸显,生态危机开始威胁人类的生存,这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最直接社会历史背景;其次,随着资本主义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全球垄断资本主义转变,在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不断冲破国家疆界走向国际化、区域化、一体化的过程中,生态危机也随资本主义拓展呈现出全球化态势;最后,当前资本主义国家劳动方式的改变及“劳动者”阶级的势微,再加上东欧与苏联的政权崩溃,导致经典社会主义理论开始受到西方左派的质疑,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一系列“新社会运动”,他们结合自身的理论背景和认识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进行重新审视和思考,试图寻找出一种实现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这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政治理论基础。

一、工业文明的发展与全球生态危机

14世纪初,统治欧洲近千年的“黑暗时代”遭遇了“中世纪晚期的危机”^①,从这个世纪开始,欧洲遭受了一连串的打击与动荡,固有的社会结构快速解体,宗教的统治基础受到冲击,神学的权威慢慢削弱,哲学逐渐摆脱了被监护的地位,人们开始相信真理并不是固化的神学教条,只有通过自由而公正的探究才能获得。与神学家们主要研究超自然的天国和上帝不同,此时的思想家开始把注意力从天上移到人间,对自然、理性、科学、自由等的关注开始逐渐走到台前,随后发生的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更是廓清了神学的地平,使理性主义思潮席卷新欧洲。理性主义不但在哲学上清除了神学的禁锢,恢复了人的主体性,更重要的是它也为资产阶级的形成确立了基础,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洛克的“君主立宪制”和“三权分立”思想都为资产阶级的统治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理性主义基础上形成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高扬人的主体性的社会,同时也是一个极致追求“主客二分”的社会。随着“神”的消散,人们开始认识并逐渐掌握自然规律,自然科学随之兴起,这不但为人类改善自身的生存条件提供了可能,而且也进一步唤起了人类征服自然的欲望——人不再需要屈服于自然,而是要通过征服自然来生存。以蒸汽机使用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人类技术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它开创了以机器代替手工工具的新时代,自此之后,因为机器的使用,人类得以进一步开发自然并改变自然物的存在形态。随着纺织、煤炭、冶金以及机器制造等行业的快速发展,近代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基本成型,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逐渐确立,由此社会生产力开始步入高速发展期。正如马克思所看到的:资本主义“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

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

^① 在14世纪初,欧洲遭受一连串的饥荒和瘟疫的打击,例如1315—1317年的大饥荒和14世纪中期的黑死病大流行。这段时期还伴随着人口下降、社会动乱和各个地区性的战争。英国和法国都发生了严重的农民起事:札克雷起事和百年战争。雪上加霜的是,天主教教会还发生了大分裂。这些事件有时被合称为“中世纪晚期的危机”。参见罗宾·M.温克、L.P.王德尔:《牛津欧洲史》(第一卷),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第二章。

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①

如果说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技术体系主要来自于工匠的经验,对自然的利用还取决于观察与大胆尝试的话,那么第二次工业革命在对自然的认识与改造方面则表现出明显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特点。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基本特征是把科学发现运用于生产从而创造出新的技术。没有热力学、电磁学、化学等领域的突破性科学成就,就不可能出现电力的广泛使用、内燃机和新交通工具的创制、新通信手段的发明以及现代化学工业的创立。第二次工业革命强化了一个基本信念,即自然科学的发展有助于人类了解自然、“去魅”自然,而每一次对自然神性的剥离都能进一步把人从自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进而实现对自然的征服。在这一信念支配下,人类开始习惯于在不断推进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不断开拓和发展新的物质财富形式的名义下以自然规律的主人自居”^②。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工业文明高速发展,特别是“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这段时间,高新技术不断涌现,科学技术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速度大大加快,资本主义步入“黄金时期”,“这时,人类在传统生存方式上的工业生产和经济增长率达到最高点;资源开发利用的数量和人口增长率达到最高点;发达国家进入所谓高消费社会,过度消费达到空前高水平的鼎盛时期。”^③

但是,正如恩格斯早在《自然辩证法》中就明白指出的:“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方式,都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那些只是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产生效应的较远的结果,则完全被忽视了。”^④而这种“较远的结果”一方面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对人的压迫与剥削,另一方面则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生态危机与环境问题。似乎是为了印证恩格斯这一带有预言式见解的正确性,20世纪上半叶,正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尽情享受工业文明成果的时候,生态危机的幽灵开始在地球上露出狰狞的面容,“人类好像在一夜之间突然发现自己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大量危机:人口危机、环境危机、粮食危机、能源危机、原料危机等。旧的危机已波及全球尚未度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

^② 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臧佩洪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③ 余谋昌:《文化新世纪》,中国林业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5页。

过,新的危机又接踵而至。这些都是难以克服的,人们企图孤立地克服其中任何一个的各种尝试都只能取得暂时的收效,并且往往顾此失彼。”^①

幽灵首先在发达国家显现。1930年12月1至5日,在比利时的马斯河谷工业区,在几种有害气体同煤烟粉尘的综合作用下,发生了有毒烟雾事件,在一星期之内就致60余人死亡,而随后几年,市民中肺病与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也大大增加;1943年5月到10月间,洛杉矶爆发了光化学烟雾事件,石油化工产业排出的有害气体与汽车尾气受紫外线照射后产生了致命的后果,造成400多人死亡,许多人眼睛红肿,咽炎、呼吸道疾病恶化乃至思维紊乱;1948年10月26至31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多诺拉镇在二氧化硫与金属元素、金属化合物相互作用下发生了多诺拉烟雾事件,造成5911人暴病,17人死亡;1952年12月5至8日,因为大量耗煤而导致的大气中尘粒浓度与二氧化硫浓度急剧增高,导致了伦敦毒雾事件,4天时间内4000多人死亡,两月后又有8000多人死亡;1956年,日本的水俣病被确诊,因生活用水被含甲基汞(CH_3Hg)的工业废水所污染,造成了数十万人的中枢神经系统被或多或少地伤害,据统计,到2006年为止,因为水俣病而死亡的人数已达2000人以上;1955到1968年,由于重金属镉的污染,日本富山县发生了“骨痛病”事件,在就诊的258人中有207人死亡,死亡率高达80%;从1955到1961年,由于石油化工企业排放的废气对大气造成的污染,引起了日本四日市居民中呼吸系统疾病的骤增,导致近万人深受哮喘病的折磨;1968年,日本九州市爱知县一带,因工厂生产的米糠油中混入多氯联苯导致了米糠油事件,人们食用了这种被污染的油之后,造成了1万多人中毒的严重污染事件。^②

以上就是令世界震痛的环境污染“八大公害”事件,这一系列事件给人类带来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疾病和灾难,公众开始意识到原来在富足、丰裕的生活之下掩藏着新的危机,这种危机不仅会带来财产的损失,更是会以生命的消亡为代价。面对日益危险的生态环境,20世纪6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兴起了“生态保护运动”:公众走上街头游行,要求政府采取有力措施治理和控制环境污染;科学家们对工业生产与环境污染的关联展开讨论并批评;媒体则不遗余力地对

^① 米哈依罗·米萨诺维克、爱德华·帕斯托尔:《人类处在转折点——罗马俱乐部研究报告》,刘长毅等译,中国和平出版社1987年版,第9页。

^② 曾文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25—26页。

世界各地爆发的环境问题与公害事件进行报道与披露。这次环境保护运动“无论就其规模、大众参与程度还是政府干预的力度以及公众环境意识变化的深度等诸多方面都是空前的,它对美国和世界历史特别是环境保护史的影响也是绝无仅有的”。^① 环境保护运动的兴起引发了一系列观念上的变革。首先,环保运动使越来越多的民众认识到环境污染的严重后果,意识到环境问题关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由此“不仅把一个安全、舒适的生活环境看作是幸福健康的必要条件,更是看作通向自由和机遇的一种权利”^②;同时环保运动也影响着对发展的传统认知,从 60 年代开始,“至少已有一批政治家深信不疑,并认为环境问题不仅可以解决,而且一旦解决,确能获得良好的成本效益”^③。但是观念的改变并没能促使现实问题的解决。与如火如荼开展的环保运动格格不入的是 20 世纪 70—80 年代大量公害事件持续在世界各地爆发,其中尤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三哩岛核电站泄漏与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件为代表的环境污染“十大事件”^④最为严重,这十个环境污染事件不论是污染的范围与严重性、民众受伤害的程度还是所造成的财产损失与早期“八大公害”事件相比都远远超出。

上述公害事件虽然给许多无辜百姓造成了伤害与痛苦,但这些相对独立的环境污染事件因其孤立地存在,影响往往局限在一定范围。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经济全球化的开启,工业文明迅速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全世界推广,环境问题也由区域性环境灾难扩张为全球性生态危机,而其中臭氧层空洞和全球变暖无疑把全球公众置于了共同的危机之中。20 世纪 70 年代,科学家发现地球南极上空的臭氧含量正在逐渐减少,而随后美国“云雨 7 号”卫星的测量表明,在南极上空已形成一个巨大的臭氧层空洞,面积接近 900 万平方公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空洞不断扩大,到 1994 年时为 2400 万平方公里,而 2000 年则达到创记录的约 2800 万平方公里,相当于 4 个澳大利亚。臭氧层空洞的产生主要是因为工农业和空运业的高速发展,使大量氮氧化物和其他含氮气体进入臭氧层破坏了臭氧分子,降低了臭氧层的浓度,进而出现空洞。臭氧层被破坏无疑

^① 腾海键:《试论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美国环境保护运动》,《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7 期。

^② 菲利普·沙别科夫:《滚滚绿色浪潮——美国的环境保护运动》,周律等译,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 页。

^③ 戴维·莱茵:《地理信息系统与环境问题》,《国际社会科学》1992 年第 4 期。

^④ 庞元正、丁冬红:《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新词典》,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77 页。

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目前已知比较严重的有:(1)会对人类造成直接伤害,使皮肤癌的发病率大大提高。并且臭氧的减少还会损伤人体免疫系统,使人对疾病的抵抗力下降。(2)过量的紫外线会影响植物光合作用,使植物总量减少,同时紫外线还可能导致某些生物物种的突变,破坏地球生态系统。(3)“臭氧空洞”会使紫外线穿透大气层进入近地面后产生光化学烟雾,这会导致汽车、工厂等向大气中排放的碳氢化合物和氮氧化合物在紫外线作用下发生光化学反应生成二次污染物。(4)过量的紫外线会杀死水中微生物,削弱浮游植物的光合作用,破坏水中生物的食物链,引起水生态系统恶化。而最令人担忧的则是,据估计:如果臭氧层空洞不断扩大,乃至笼罩整个地球,人类可能在一年里就灭绝。^①

全球变暖是人类遭遇的另一严重生态危机。全球变暖是由温室效应引起的,虽说在大气中能引发温室效应的气体将近 30 种,但全球气候变暖的罪魁祸首却是含碳(C)气体,其中二氧化碳、甲烷和氟利昂分别起到了 66%、16% 和 12% 的作用。在温室气体作用下,全球气温近百年来持续上升,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在 1990 年对全球气候变化进行的评估中指出,自 20 世纪以来,全球气温整体上升了 0.3—0.6 摄氏度,而 IPCC 在发表的第三份气候变化评估报告梗概中,更是预测到 2100 年,全球平均气温将升高 1.4—5.8 摄氏度。根据这一预测,全球气温将出现过去 1 万年中从未有过巨大变化,从而给全球环境带来颠覆性影响,不仅会引起海平面上升、高山积雪减少、土地干旱、气候带转化等多发性灾害事件,更重要的是如果全球变暖的趋势不能得到有效遏制将会给人类带来致命威胁。据美国纽约锡拉丘兹大学的科学家通过从格陵兰抽取的 4 块年龄由 500 至 14 万年的冰块研究表明,某些史前病毒可以在冰层中长期存活,而全球气温上升会令两极冰层融化,这样被冰封十几乃至数十万年的史前致命病毒可能会重见天日,从而导致全球陷入疫症恐慌,使人类生命受到严重威胁。^②

除以上两种令全球忧虑的事实之外,与人类随行的生态危机还有以下三大类:(1)环境污染问题。包括大气污染、水污染、工业废物与生活垃圾污染、噪音污染等,这也是发达国家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采取环境保护时所优先考虑解决

^① 梅雪芹:《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93—194 页。

^② 甘德建:《可持续发展哲学引论》,博士学位论文,中共中央党校 2004 年,第 18 页。